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民主与独裁：国家权力的性质和限度

[意]诺伯特·波比奥◆著
梁晓君◆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民主与独裁：国家权力的性质和限度

[意] 诺伯特·波比奥 ◆ 著
梁晓君 ◆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与独裁:国家权力的性质和限度 / (意)波比奥著;梁晓君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8

(人文译丛)

ISBN 978-7-206-06947-5

I. ①民…

II. ①波… ②梁…

III. ①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3079 号

民主与独裁:国家权力的性质和限度

著 者:(意)诺伯特·波比奥 译 者:梁晓君

责任编辑:丁 昊 封面设计:张 迅 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制 版: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9.5 字数:15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6947-5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时有奇葩竞放，异彩纷呈。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须。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惮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曰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以古希腊为要。二曰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三曰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四曰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五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六曰《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数年来能有此初步实绩，端赖吉林出版界领导周君殿富、

胡君维革大力支持及责编与诸多译校者鼎力相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文复兴并非“指日可待”之事，我们愿使“人文译丛”成一长久事业，除继续充实现有专辑外，亦将开辟新专辑，并深祈此一事业继续得到各界同人的关注与支持。

何怀宏

2002年11月18日

谨识于北京西郊泓园

重版总序

凡是在出版业工作的人都知道一句行话，叫做“选题定位”，或曰“图书定位”，亦曰“市场定位”。我非常赞成这句话。一个出版社必须进行明确的选题定位，只有明确的选题定位，才能打造图书品牌乃至出版社品牌，只有有了品牌才能占领市场，出版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近些年来，我社的选题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主打国内外学术类图书。就国内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年实录》（10 卷）、《北大哲学门》（10 卷）、《高清海哲学文存》（6 卷）、《孙正聿哲学文集》（9 卷）、《楚辞源流选集》（5 卷）、《中日甲午战争全史》（6 卷）、《毛泽东评点的帝王大传》（16 本）、《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6 卷）等高档次、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就国外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引进出版了《人文译丛》（60 本）、《绿色经典文库》（16 本）、《大美译丛》（8 本）、《支点丛书》（10 本）、《世界经济畅销书系》（10 本）、《人类文明史图鉴》（24 本）、《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读本》（22 本）、《美国思想史》、《西方建筑史》、《剑桥战争史》、《剑桥医学史》等在世界上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好评。从总体上说，图书的价值主要在“传承”和“传播”4 个字上。“传承”是就历史纵向而言，图书要为后人传承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成果；“传播”是就历史横向而言，图书要向世人传播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知识。我社出版的学术类图书，虽然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但我们一直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我社引进出版的外国学术类图书中，最有影响的是何怀宏先生担

任总主编的《人文译丛》这套丛书。何先生是一位学术精深、工作认真、待人诚恳、诲人不倦的专家学者。为编好这套丛书，他亲自确定书目、遴选译者、审阅书稿，每一本书都饱含了他的心血。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10年的努力，到现在这套丛书一共出版了60本。一个地方人民出版社能够出版一套60本的外国学术著作丛书，实属不易。每当看到这套丛书时，我们总是对这套丛书的总主编何先生产生由衷的敬意。

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文译丛》这套品牌性图书，最近，我社调集30多名资深编辑，对这套丛书进行了重新出版。在重版过程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三项工作。第一，将已经出版的《人文译丛》中的图书悉数收入，同时又从我社出版的外国学术著作中选出20本，加在《人文译丛》中，使《人文译丛》总量达到80本。第二，将收入《人文译丛》的80本图书，统一开本，统一纸张，统一版式，统一封面风格。第三，对80本图书进行重新编辑校对，对个别图书的有些文字或段落进行了处理。通过以上工作，使这套丛书更加完善了。

有人说：翻译出版一本外国学术著作，比自己撰写出版一本学术著作还要难。这话很有道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重版的《人文译丛》尚存在着以下三点不足。第一，有个别图书，从学科属性上讲，放在《人文译丛》中不甚合适，敬请广大读者原谅。第二，有些图书中的个别译文还不够准确，编校也不够到位，敬请广大读者指正。第三，有些图书中的思想观点，囿于历史局限，我们不能接受，敬请广大读者进行批判性的阅读。

重版《人文译丛》，对我社来说，既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三个多月的工作中，全体编辑、校对、照排和印制人员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令我感动不已。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我真有许多感谢的话要说，纸短情长，不尽一一。

胡维革

2010年9月28日

于长春百汇街寓所

前 言

本书收集的四篇文章最初是为埃诺迪（Einaudi）百科全书而作。这四篇文章分别是：第四卷中的《民主与专政》（1978），第十一卷中的《公与私》（1980），第十二卷中的《公民社会》和《国家》（1981）。我必须提前向读者表示歉意，因为以上四篇文章主题密切相关，因此也不可避免会出现重复。第一篇与第四篇文章涉及两组相对立的概念，第二篇和第三篇则分别是关于公民社会和国家，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同样是一组重要的相对立的概念。

埃诺迪百科全书的重要指导原则之一是和持对立观点的人共同探讨某一术语，这非常符合我的研究旨趣。1974年我写过一篇关于公法和私法之区别的文章，我将之称为“伟大的两分法”；民主和专政的对立则是自凯尔森、康德以降哲学上自治和他治之对立在普通语境中的再现，这一话题在我的研究中也多有涉及；我还曾梳理过黑格尔、马克思和葛兰西作品中关于公民社会与国家的论述，并写过一篇题为《公民社会》的文章，发表在《政治学词典》一书中。

长期以两分法进行研究使得我们更加善于通过一个词的对立词来阐释该词，弱词经常被直接界定为强词的反面，譬如“私”被界定为“非公”；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想强调一个词的肯定的或否定的判断时，例如在古代人们讨论民主和独裁哪种更可取时，这一借助一词阐述另一词的方法显得尤为重要。历史上两分法甚至被用来概括哲学史的发展，譬如有过这样的表述：“从私法为主的时代到公法为主的时代的转变”。

四篇文章中最长的是《国家、权力和政府》，它是《国家》一文的再版。它部份地概括和总结了其他三部分。我把这视为一种尝试，不管成功与否，尝试着把从法律意义上作为法律体系的国家 and 政治学意义上作为主权利力的国家的有关问题纳入到一个体系中。在这篇文章中，我厘清了一些概念，尤其是关于权力、权力的形式、权力的合法性标准等。在此之前，我从未如此全面地予以探讨。其它文章则是较早以前或者晚近发表过的文章的改写：《公和私：伟大的两分法》部分来源于 1982 年发表的文章《公与私：关于一场辩论的介绍》以及 1980 年发表的文章《民主和看不见的权力》；《公民社会》一文则可以追溯到 1968 年发表的文章《关于公民社会的概念》；《民主和专政》一文很大程度上来源于 1976 年发表的文章《政治思想史上关于政体的理论》。

以上均是我过去十年来一直在研究的问题，他们共同形成了一个尚待进一步研究的政治学理论框架。

诺伯特·波比奥

目 录

前 言	001
导 言 民主与左翼的衰落	001
 第一章 伟大的两分法：公与私	
两分的组合	017
相应的两分法	019
大两分法的评价性运用	023
大两分法的第二种含义	028
 第二章 公民社会	
多种含义	032
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035
黑格尔体系中的解释	038
自然法传统中的解释	041
作为文明社会的市民社会	043
当前的争论	045
 第三章 国家、权力与政府	
对国家的研究	048
名与物	058

国家与权力	068
权力的基础	077
国家与法律	083
政体形式	091
国体形式	098
国家的终结	108

第四章 民主与独裁

政体理论中的民主	116
描述性路径	117
评价性路径	119
历史性路径	125
现代民主	127
代议制民主与直接民主	130
政治民主与社会民主	132
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	133
古代独裁	134
现代独裁	136
革命独裁	138

导言：民主与左翼的衰落

约翰·凯纳

左翼的衰落

在当今时代，成为左翼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既具有理论上和政治上的重大意义，又是如此令人费解，几无出其右者。尽管如此，“左翼”一词的起源却不存在任何争议。

众所周知，左翼一词产生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1789年法国三级会议围绕皇室否决权问题发生激烈争论，与会者分裂成坐在国王左边的第三等级和坐在国王右边的贵族。左翼在19世纪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它使得国家（Body Politic）概念处于持续的分化之中，而人们在关于社会变化和政治秩序问题上的对立态度使这种分化趋于永恒。与那些尊崇严格的秩序和社会控制的、拖后腿的右派保守主义者截然相反，左派分子更加积极。他们对科学、理性和工业持乐观的态度。他们宣称，他们热爱自由和平等，其基本诉求是追求人类本性中的善和社群性。左翼同情社会中被欺压的弱势族群，他们蔑视达官显贵，他们将资产阶级民主痛斥为布尔乔亚制度，他们将解救全世界于资本主义罪恶、物质匮乏和不幸之中作为人生理想。

自一战以来，这一经典的左翼形象正在慢慢瓦解。左翼开始对现代性抱持更加审慎的态度。他们不再被科技进步的神奇所吸引，尤其他们中的绿色环保主义者，更是对产业主义抱有公开的敌意。相反，倒是以撒切尔夫人等为代表的右派，放弃了过去的怀旧情结以及保守谨慎的行

事风格，他们基于对科学和经济现代化的信仰，在国内推进革命或进行改革。同一时期，发生在东欧的一些历史事件使得左派形象大受损毁。其结果是左派被认为兼具狮子和狐狸的技能，且抱有对政治权力以及将个人和社会生活完全政治化的热情。

左派主张国际间无产阶级大团结以及反对国家暴力的根本形象也遭到严重质疑。民族国家共产主义政权的出现，证明了左倾主义并非无私国际主义的同义词。这些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最近在这些国家之间爆发的战争都强化了左派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政治强权形象，而这一形象和他们的右翼对手别无二致。

近年来，左翼这一术语的含义陷入了更大的混乱，尤其在西方国家。它已经成为一个模糊的标签，其中的歧义部分大于清晰部分。20世纪50年代末期新左派的出现是产生这一趋势的源头之一。1945年以来，一些左翼政府和政党对混合经济的热衷以及最近对市场主义、利润动机以及小企业的迷恋，都进一步模糊了左派典型的特质。而曾经被认为是左派天然支持者的工会对凯恩斯通货再膨胀政策失败的模糊反应使情况变得更糟。左派典型特质的消解又因为去工业化、新低下阶层的发展以及更具灵活性的科技、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出现而进一步加剧。西方左派的迷失也可以追溯到他们怀旧式地固守集权化官僚政治以及他们过时的管理和计划技能。左派传统的观点，即国家计划、确定的市场、有选择的国有化再加上花钱等于社会主义，也有所松动。部分左派则沉湎于过去的骄傲感中，他们拒绝相信未来，加上智力迟钝，左派的表现越发不济。他们或者屈服于右翼和平演变的力量，或者重复一些陈词滥调，通过传统的标签从事政治活动，等等。

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诺伯特·波比奥的作品是对当前左派面临的困境的重要反思。他的著作是开创性的，因为他认为，重新定义左翼的关键在于更多地诉诸民主。那么波比奥所说的民主究竟意指何处呢？波比奥对该术语的理解是一位自由社会主义者非同寻常的理解。这得益于他早期的一系列经历，如20世纪30年代他在都灵所沐浴的自由知识分

子氛围，他参与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经历，他与意大利左派尤其是意大利共产党的一系列智识对话和时政对话，以及他在意大利议会政治中终身参议员和独立评论人（franc-tieur）的角色^[1]。这样的经历使他坚信（面对20世纪的庸俗化），民主的概念不是弹性的，它不是一个可以任意解释任意拿用的词汇。在他的理解中，民主是一个程序规则系统，它规定了由谁、经由何种程序、被赋予何种权力或者做出决策。与一切形式的非自治政权相比，民主是由一系列程序组成的，这些程序确保一切相关利益方最大可能地参与集体决策。在波比奥看来，民主程序至少包括：平等，成人普选权，多数决法则和保障少数人权益（这确保集体做出的决策会被期望做出决策的大多数人所批准），法治，宪法对集会、言论和其它自由的保护（这有助于使那些想参与决策的人或者想参与选举决策者的选民能够在真正有区别的备选方案中做出选择），等等。

在此意义上，民主是一种防止统治者盗用永久性权力且用之为己服务的方法。权力的行使者必须受制于一套程序，使他人有权质询、轮替甚至解雇他们。民主体制中的权力分配应该基本反映出基于恒久的决策法则而进行的政治角逐的结果。冲突和妥协因此是机制化的，权力是世俗的、无实体的，它不会永远属于任何特定的个体或者群体，例如某个王室。相反，权力的实施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根据民主游戏的法则，他们会被轮换、替代，他们必须对其他人负责。

波比奥认为，当今的左翼对民主法则的性质、重要性，尤其对是否要改革或取代这些法则的认识是混乱不清的，或者干脆全然不知。因此，他决定挑战那些左翼关于民主的典型的错误观念。例如，波比奥相信，自由民主制度（例如自由选举制度，竞争性政党制度，成文宪法等）在历史中的出现，代表了朝争取更多民主的斗争方向的伟大跃进。自由民主制度并不必然是一种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设计，自由民主（如列宁所言）不是资本主义最好的政治外壳，自由民主制度实际上是防止政治家们远未结束的傲慢自大的必不可少的堡垒，是限制国家权力扩大和自大的重要机制。后自由（post-liberal）的民主是可以想象的，值得期许的，

而非自由 (non-liberal) 的民主无论在词义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自相矛盾的。

波比奥坚称，民主的支持者必须抛弃新左派一贯主张的消灭所有组织而代之以所谓的“自发行动”的糟糕想法。没有程序规则的民主政体不仅在字面上是自相矛盾的，在实践中也往往会沦为武断决策和不良治理的工具。当然，民主的支持者也意识到，在一个结构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中，完全以直接民主代替代议制民主从技术上讲是不可行的。直接民主要求（在决策影响整个政体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公民举行公开集会，因此直接民主——公民在市场^[2]的集会——仅仅适用于“人们易于集会并且每个公民很容易就互相熟识”（卢梭）的小国家和小组织。聚讼纷纭的是，波比奥认为试图将直接民主的原则强加给代议制度，例如将选民权力托付给选举出的议会代表是不可行的，因为此举违背了议会民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原则，即议员们代表的是普遍的公意，而不是狭隘的部门利益或者地区利益，因此他们应该有独立于他们所代表的选民自主行动的权力，有自由谈判的权力。

波比奥强调，直接民主得以繁荣的前提是共识决策，因此当政策选择余地较小时——核力量或者非核力量，战争或者和平，堕胎合法或者非法——它的效果是最好的。否则，自治群体内部必需的信赖、耐心和相互支持就会因为多种观点的相互冲突以及这些缺乏中间状态（也即缺乏委托民主或代议民主机制来过滤或者简化多种相互冲突的观点）的观点之间存在的难以解决的紧张对立而备受考验。

这决不意味着代议的议会民主已经被广为接受和实施。波比奥明智地意识到代议制民主受制于市民社会中社会力量的积聚。绝大多数公民在关于经济投资、生产、增长等重大决策中无缘置喙。教堂、工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其它机构的民主程度亦不高。在实践中市民社会如何达到更高层次的民主，波比奥的论述中对此语焉不详。他仅提及有必要发展、扩大、加强现代民主从中诞生的所有机构。在他看来，处于优先位置的应是用社会民主补充政治民主——将民主程序从政治维度（在这里个人

被视为公民)扩大到社会维度(在这里个人被看作是男人、女人、企业家、工人、老师、学生、生产者、消费者)。应优先考虑公民应该争取“哪些领域”的选举权,如同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当时备受关注的是争取“谁”拥有选举权的斗争。

波比奥强调,在实践中,民主的改进和延伸——扩大公民参与选举的领域——并不一定要求所有人成为完全的政治动物。过度民主等于扼杀民主。生活的完全政治化以及试图制造一个全职全权公民组成的社会实际上走向了民主的反面,那将产生可怕的、不切实际的后果:所有事情将被定义为政治性的,个人生活将被公共领域所吞噬,人们将被迫转变为完全公民。而且现代社会日益增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公民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就那些直接或间接影响他们生活的事情做出决策。如果是那样,自由时光将成为过时之物,全职全权公民将生活在无休止的会议、没完没了的谈判以及持续到半夜的电话铃的梦魇之中。因此,国家权力应限制在宗教社区、家庭、教育科研中心、市场等非国家领域之外,而在波比奥看来,欧洲很好地传承了这一历史传统。

波比奥在试图重新界定左翼政治的含义时,其中心的、突出的特点就是他深感限制国家权力及其范围的必要性。他认为国家权力的存在是必须的,但也是危险的,易导致腐败的,因此需要采取预防措施以及进行有效的防卫,例如倡导与国家并行不悖的社会力量和组织的多元化。按照波比奥的观点,左派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在他们自己的机构中产生出国家机器:既有效又不会导致压迫;换言之,既能作为公民社会的一个部门有效地发挥作用,同时又不会堕入独裁。

大两分法

这本集子由一些互相关联的文章组成,类似于一本重要的政治学术语小百科,其中充满了真知灼见。波比奥一贯不喜欢模糊不清的行话以及诉诸情感的口号,他的知识分子气质始终是怀疑的、民主的,充满了

对事物复杂性的了悟。集子中收录的论文认真仔细地分析了从古典时代、中世纪直至现代的各个时期人们对政治行为范围和限度的反思。这些文章就像历史语义学练习，它们试图重构某个政治术语因时而变的内涵。这个练习从广度来看显然是无限的。因为总是有新的文本有待解读，总是有更深刻的见解提出来，它们反过来又修正和丰富了现有结论。通过集中论述一些重要的政治术语及其对立词汇，如公和私，市民社会和国家，民主和独裁（这些术语对于人们解决如何限制和控制国家权力使用的问题是关键性的），波比奥实现了既定的目标。他对每组概念的选择（波比奥称之为大两分法）反映出他的研究路径是紧紧追随现代自由宪政主义传统，这极为难得，而且这一视角使得文章更具启发性。通过与一词的反义词进行比较来挖掘该词的词源、解释词义变迁及词语内涵，这种方法是独特而有效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解读以往著述对有关词的阐释，从而更好地理解任何特定的政治体系或者特定历史时代的结构。例如，现代的“*differentia specifica*”以及它的政治思想范式只有通过与该词在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含义相比较才能更好地把握。同样，只有这样才能跨越民主理论的崎岖小道。

本书集结的论文对于指引我们探索有关问题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波比奥首先讨论了“公”和“私”的两分。这一对词汇最早走进西方政治思想史，当时用来区分什么属于集体主义群体，什么属于个人或者家庭、企业这些次群体。“公”和“私”两分之下又包含了波比奥熟练而耐心地梳理出的其它重要两分，例如：平等的联合体和不平等的联合体，公法（由政治权威强加的）和私法（规定了私人之间在财政、继承、婚姻等方面的交往），分配性正义原则（在荣誉、职责的分配中指导公共权威）和交换性正义原则（包括买、卖、劳动契约以及其他被认为具有同等价值的私有个人合团体）。

波比奥指出，“公”和“私”之间原来的区分是有序的阶层化，也即相对于边缘性权力“私”来说，“公”是至高无上的。例如，西塞罗将“共和”定义为人们为公共利益聚合在一起。这一“公”对“私”的